

南开中学师生抗战二三事

徐鲁



1936年6月19日,何其芳为天津出版的《大公报·诗刊》第一期写了一篇创作回顾性质的散文《梦中道路》。这位早已成名的“汉园诗人”在文中袒露了“厌弃我自己的精致”的心迹。其中写道:“有一次我指着温庭筠的四句诗给一位朋友看:

悠悠楚水流如马,
恨紫愁红满平野。
野土千年怨不平,
至今烧作鸳鸯瓦。
我说我喜欢,他却说没有什么好。当时我很觉寂寞。后来我才明白我和那位朋友实在有一点分歧。他是一个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寻一分意义;我呢,我从童时翻读着那小楼上的木箱里的书籍以来便坠入了文字魔障。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

这里说的“一位朋友”,即是与何其芳同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的青年诗人毕矣午。1934年,毕矣午在南开中学教初中国文课。此时在这里教书的还有李尧林(巴金的三哥)、高远公(王国维、梁启超的学生)、李苦禅等,加上在这里就读的黄裳、黄宗江、周杲良(周叔弢的儿子)等“文学少年”,已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南开中学文学圈”。

1937年春天,何其芳从天津、山东辗转回到四川家乡,先在万县师范教书,后又到成都一所中学任教。这时的何其芳还在低声吟哦着波德莱尔的“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并且幻想着,“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到了7月7日,抗战的枪声响起,焦土之上,哪里还容得下一个“茅草的屋顶”?面对残酷的、血与火的现实,诗人一改往日精巧、纤细和唯美的诗风,仿佛火山岩浆喷发,又如吹响号角一样,写出了一首振聋发聩的、表达了投奔革命与光明的心志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这首诗的完成,也成为何其芳文学和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在这首诗写出后不久,何其芳得到一个消息:作家沙汀已获得中共四川省委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车耀

先同意,即将北上赶往延安。何其芳赶忙找到沙汀,希望一起前往延安。诗人的要求得到了组织的同意。于是,1938年8月8日,何其芳和沙汀、卞之琳等友人一道,告别还在沉睡的成都,沿着川陕古道,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一路向北,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圣地延安。

这时的延安,在全国人民心中,是红星照耀的最光明的地方,也是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希望所在。何其芳和朋友们甫到延安,每人领到了一套八路军军的灰布制服。这些穿惯了长衫,西装的文人,突然穿上了灰布制服,个个兴奋得像少年一样。

进步和光明的延安和边区的生活,给何其芳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以一种完全有别于以往的清新、朴素和健朗的诗风,在延河之滨写下了《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一)》《夜歌》《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快乐的人们》等具有“抗战史诗”气象的长诗和组诗,也写出了诸如《黎明》《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河》等脍炙人口的抒情短诗。这些作品体现了中华民族誓与敌寇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在诗中,他对中国的胜利和未来充满了热望,对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也充满了热诚的期待。

作为南开中学学生辈的黄裳,曾在《谈何其芳》一文中说,从何其芳这时的诗歌里,可以看到诗人是怎样在选择他的道路,“这些诗也都是人民的号音,而不是红楼上、灯罩下,少年情人的歌唱了”。

在延安,何其芳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系主任。1939年春,他与沙汀和鲁艺一些同学一起,跟随贺龙将军到过晋西北前线,写下了不少讲述延安和晋西北军民抗战生活的报告文学。可以说,正是抗日的烽烟和漫长的抗战岁月,把一位擅长“画梦录”的诗人,变成了一位革命的诗人和文学家,变成了一位彻底的革命战士。

何其芳在散文《回忆延安》里,记述了一个延安孩子的趣事:他的邻居家有个男孩,名字叫里宾,只有六七岁,平时有点顽皮,但是对延安的生活,已经有了自己的

认识和觉悟。有一天吃午饭时,因为公家食堂的菜不合口,何其芳就自己炒了一碗鸡蛋。正坐在窑洞门口吃的时候,被这个小男孩看到了。小男孩指着何其芳说:“你差不差呀?跟老百姓吃得一样好!”这句话给何其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个小孩的小小脑袋里,有着何等清晰的认识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和战士们,都不应该比老百姓吃得好,而应该让老百姓先过上好日子。这件小事,也让何其芳深有感触地认识到,这个小男孩的思想和觉悟,正好反映出了当时延安真实的生活现实: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就是为了老百姓先吃得好、先过上好日子。

再看诗人毕矣午的经历。1928年,正当青春年华的毕矣午,因为向往“光明”的发源地,便与北平师范学校的学生王荣庭(即后来被称为“西部歌王”的音乐家王洛宾)结伴到了哈尔滨,打算从哈尔滨奔往红色莫斯科。但由于各种阻力未能成行。在哈尔滨流浪的日子里,他和同学一起住进了有如高尔基笔下《夜店》的鸡毛小店。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当时最底层的生活和最下层的人物:卖苦力的、无家可归的逃亡者、白俄浪人、小偷、乞丐、下等妓女,等等。这些阴暗的生活面和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为他后来的创作储备了素材。

抗战前夕,毕矣午在南开中学教书期间,何其芳、李尧林等同事不仅在教学上给予了毕矣午直接的帮助,同时他们也成了他创作上的挚友。那时正在北京编《文学季刊》的巴金和靳以,还有主编《水星》的卞之琳,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萧乾,以及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任教的曹禺等,也相继成了毕矣午的师长和朋友。师友间的切磋帮助使他的创作日臻成熟。可是,就在这颗诗坛新星刚刚升起之时,抗战烽火燃起,中华民族进入了空前苦难和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作为一介书生、不愿做亡国奴的毕矣午,被日本法西斯投入了监狱,受尽了屈辱和非人的摧残。日军的黑牢当然不是歌吟的场所,诗人被迫放下了诗笔,暂时停止了“歌唱”。

《曝书亭集》卷六十七收入的《天津卫稽古寺重修藏经阁记》一文详细记载了当时铃铛阁的景况:“天津卫属京畿之冲,城之西门有稽古寺,藏经之阁峙焉。地近海多风,飞沙晦冥。岁未久,阁圯。浮屠舍光者新之……夕阳在衣,风铃铮然,翔鸟上下,为之目旷神怡。含光语予曰:‘凡吾材之所需,并税之人,升盘之储,积之累年始成焉。俾阁之颓,而经藏将失也。’今缙绅学士,诵法周孔,其于《六经》百氏之书,旧闻放失,往住置勿问。而府州县学或倾废不治,不有愧于佛氏之徒也哉!浮屠之言,虽非圣人所与,而能崇奉其教,以兴废自任如含光者,殆亦圣人之徒之所进也。遂为文以记之。”该文作者朱彝尊(1629—1709)乃浙江秀水人,浙西词派创始人,康熙十八年(1679)以布衣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撰《明史》,曾多次来津。《天津卫稽古寺重修藏经阁记》的写作时间应在他50岁入选翰林之前。

清乾隆、嘉庆年间,津门文风大盛,铃铛阁又设置了藏书楼。书籍大部分为当时社会名流所捐赠,多为稀世之珍。海内孤本达数百种之多,尤以元、明人手抄本及六朝写经四十余卷最为珍贵。据《县志》载,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为“晒经节”,是日阁内全部藏书均置于阳光下晾晒,驱虫防腐,并借此良机供人阅览,以赅读者。当时津门一些文人士纷至沓来,先睹为快,一时间盛况空前。

光绪十三年(1887),因稽古寺僧人沙圆、普泽不守清规,先后变产挥霍,违律潜逃,寺内无主。邑绅崔铨、杨云章等十余人将寺院改作“稽古书院”,以经解诗赋课士。光绪十八年(1892),因稽古寺附近一木材厂失火殃及铃铛阁,可惜这一著名古迹被付之一炬,成为千古憾事。后来津人才有“鼓楼拆炮台倒,大火烧了铃铛阁”的说法。据说起火的原因是铃铛阁旁有空地不足一亩,被一木商购去栈存木料,并在阁旁建屋。有数人每日锯木,然后将所锯木板立在阁墙下晾晒。一日不慎失火,邻人闻警争先救火,而这个木商却持刀站在门口,禁止人们入内救火。木商只顾搬抢木材,时值西北风大作,火势蔓延,结果铃铛阁全部被焚,阁中藏经也未幸免于难。还有传闻,阁中所藏经书有数部为一乡邻居士借去抄阅,火后归还。果真如此,则那些珍贵佛经尚能保存若干,也算是天津的幸事了。

铃铛阁焚毁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津门学者高凌雯、王世芸等倡议以稽古书院为基础创办天津普通学堂,并起名之为“天津官立学堂”。随着历史的变迁,这所早期学堂多次更名为“官立中学堂、天津府中学堂、天津中学堂、河北省立天津中学堂、天津市立第一中学、直隶省立第一中学”等,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天津市第三中学”。1960年第三中学迁校移址,原校址为现在的铃铛阁中学。

徜徉在芥园道上,你会瞧见铃铛阁中学那古朴庄重的门楼。在这块宝地上,我们看到了操场上那棵参天的大树又抽出了新枝,吐出了新绿。



沽上丛话



教泽宏敷

斯文未坠

张福义
治印

北宋嘉祐二年(1057),20岁的苏轼与父亲和弟弟一起辞别家乡眉山,到汴京参加进士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看到这篇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对其结构之严谨、说理之透彻、论证之严密大为赏识,当即决定判为第一名。但转念一想,这篇文章的作者会不会是弟子曾巩呢?如果判作第一名,一旦真的是曾巩的作品,在他人看来一定会觉得自己在徇私舞弊。一番犹豫、权衡之后,欧阳修最终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名。等拆封试卷之后,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居然是来自遥远四川眉山的苏轼,欧阳修抱愧不已。后来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作为文坛霸主,面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欧阳修不存半分私心,不担心他声名日盛超越自己,不担心他耀眼的光芒遮蔽自己,威胁到自己在文坛的地位,而是心甘情愿为之避路,让他早日出人头地,被世人熟知。这是多么宽广豁达的胸怀!这是多么光明磊落的气度!

唐代诗人白居易年轻时赴长安谋求发展也有一则故事流传。故事云:当年白居易携带诗文拜谒文坛名士顾况,顾况初见白居易,便以他的名字戏谑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指长安物价高昂,居住不易),暗含对其能力的质疑。白居易不卑不亢,把自己的诗文一呈上。顾况慢慢浏览着,当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惊叹其才华,随之改口道:“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这个故事出自唐人张固的笔记小说集《幽闲鼓吹》。这个故事中令我敬重的是顾况,面对一个文坛“小白”,他最初多少是带着轻慢的态度开玩笑,但读了白居易的诗句后则放下了轻慢,态度转而变得谦恭起来,并且诚挚地向白居易道歉,承认自己先前是随口乱开玩笑的。由于有了顾况“居天下亦不难”的赞誉加持,白居易很快便在长安声名大噪。顾况真诚坦荡的胸怀,人格魅力的勇气,对后生晚辈诚心实意的心折首肯,千百年来,他的个人魅力令人心生敬意。

艾青在《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一文里说到毕矣午的诗时,这样写道:“诗人似乎就一直生活在已经沦陷的城市里,除了读到他这样痛苦的诗之外,从来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朋友们一度认为,毕矣午可能死在法西斯的监狱里了,所以,在牢狱之外的巴金等朋友搜集起毕矣午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抗战诗篇,为他编印了一本薄薄的集子《雨夕》。集中有一首《火烧的城》,艾青在引录了这首诗的片段后评价说,作者不仅“保持了《灭亡》的情感的深沉和语言的朴素与有力”,而且写出许多“刻画土地沦亡的痛苦的诗篇”。五十年后,艾青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27—1937)时,收入了毕矣午在抗战前后创作的数篇作品,并加以赞赏。

所幸的是,青年诗人最终没有死在日寇的牢狱里。抗战胜利后,当他重新出现在朋友们眼前时,已经是一位坚强的文化战士了。1949年,毕矣午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南文联、湖北省文联、武汉市文联、湖北省文化局等机构的领导职务,1950年调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黄裳,原名容鼎昌,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与黄宗江、周杲良等是同学,李尧林是他们的恩师。他在南开中学就读期间,已在校刊《南开初中》和《南开高中》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文笔可谓少年老成。南开中学被日寇炸毁后,他和黄宗江逃到上海,黄宗江开始“下海卖艺”,他继续在上海中学就读。“黄裳”本是此时他赠给黄宗江的艺名,但黄宗江以其“过于辉煌”,未敢使用,他便自己用作了笔名。黄裳中学毕业后考取了交通大学电机系,成为“正宗”的大学工科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周年之时,黄裳又与黄宗江结伴逃离“孤岛”上海,辗转抵达重庆。先是靠写作糊口,后来又在位于小龙坎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厂从事制图工作。从这个器材厂出厂的一些无线电器材,有一些通过各种秘密途径,被送到了抗日战场上。那时,重庆上空不时传来日寇空袭的警报声,敌机扔下的炸弹在嘉陵江上溅起巨浪。不久,因为英文水平不错,黄裳应征参加了抗日远征军,在滇缅丛林的战场上为美国兵担任翻译。这时候,黄裳发挥了工科生的优势,不仅能开枪,而且还能动手维修军用吉普车。这段战地生活经历,在战后不久,被他写进了《关于美国兵》这本纪实散文集中。

可以说,正是七七事变的炮声,把包括何其芳在内的南开中学文学圈的师生们从文学梦中震醒。在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烽烟里,他们无一例外地毅然挥别了“梦中道路”,从不同的方向加入了全国抗战的洪流之中,并且用各自的行动,践行了何其芳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里的“预言”:“在长长的钢的链条间,我是极其渺小的一环,然而我像最强硬的那样强硬。”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抗战文艺回眸

影片的故事主体在上海,那里的地下党千方百计地与延安保持联系,那条红色的电波将两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延安自从1937年1月成为中共中央驻地之后,就是无数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这部电影片头的主题曲《延安颂》即奠定了它的感情基调,对于延安寄予了深切的感情,这首歌曲并不是为电影量身定做的,而是由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创作于1938年的延安,是当时的青年对延安真切情怀的反映。“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重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月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这首歌曲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巧合的是歌曲和电影中的情境都产生于1938年,却在1958年被电影创作者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我在为这妙手赞叹之余,也不禁想去追寻其后的细节。直至我读到这部电影的原始剧本,才从中窥到端倪。

1958年6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了《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剧本。在当年的4月6日,剧本已经完成了第9稿,而这时候电影已经上映。也就是说,这个剧本不是电影的最终版本。

书中的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领导同志推开窑洞的窗户,通过窗框我们看见了延安的黎明:对面山头上的宝塔隐在薄雾之中,山下的延河闪着白光,灰色的延安城墙还在朦胧地沉睡着……一阵凉风吹来远处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原来是这样,这是这部电影的编剧将这首《延安颂》率先设计到电影的内容之中,在摄制时它更成为电影的主题曲,虽不是量身定做,却与电影内容非常契合,电影和歌曲的艺术性在此相得益彰。

开窗的这一段情节,被电影导演所采纳,我在观看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个镜头。男女主人公李侠和何兰芬在正式结婚三年之后的中秋之夜,在上海也有一个开窗赏月的镜头,算是前后呼应。

在延安的男主人公李侠本想去抗日前线,后来接受组织的安排来到上海,这里是另一个前线。在上海的纺织女工何兰芬与李侠根据工作需要假扮夫妻,在艰苦、复杂、危险的环境里,二人逐渐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后经组织批准成为真夫妻。这种情况在革命年代的地下工作中并不罕见,李侠和何兰芬也是有真实原型的,那就是李白和韩慧英。

因为纪录片《曙光》的拍摄,我在湖南长沙采访先烈陈为人的女儿时,有家属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是秦鸿钧和韩慧如。韩慧如是陈为人的妻妹,也正是她帮助陈为人掩护了中共中央的档案。我听后很意外,经过查询求才补齐了我认知的短板,上海市档案馆也有相应的档案记载可以证明。韩慧如的回忆录《真正的共产党人》中也有翔实记录,但却并未提到李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分别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一度居住的地方还近在咫尺,但彼此并不知情。当时的上海同时有两个电台在运行,李白的工作从抗日战争持续到解放战争,在1948年12月30日凌晨不幸被捕,而在李白被捕之后,他所承担的汇报任务都转移到秦鸿钧一人身上,所以秦鸿钧的危险系数陡然增大,在三个多月后被捕。秦鸿钧的直接领导张因斋,也相继被捕,他们三人并称“电台三烈士”,三烈士同时于1949年5月7日被敌人杀害,20天后的5月27日,上海解放。

1938年,根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决定,为联络需要,拟在天津架设一部地下电台,因此也曾有一对青年男女假扮夫妻,与延安电波相连,后来他们也结成真正的夫妻。虽然我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也是《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电影的原型之一,但是他们的故事与李白夫妇高度相似。这对夫妻是王光杰和王兰芬,王光杰是王光美的哥哥,而王兰芬这个名字和电影的女主人公何兰芬只有一字之差。

电影艺术是虚构的,但是电影背后的故事却是真实的。电影剧本的开篇有一个题记:“献给坚守岗位,为革命英勇牺牲的通讯战士们!”这样的通讯战士,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有很多,李侠是他们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份工作是重要并且神圣的,正如在电影中李侠对何兰芬所说的,“我们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这份工作也是特殊且艰辛的,隐姓埋名,舍生忘死,这非常人可以感受。

那么,就让电波永不消逝吧!
题图为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唐代李肇的《尚书故实》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杨祭酒敬之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人士项斯,赠诗曰“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规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杨敬之是当时著名的官员和文学评论家,以善于发掘人才著称。他读到项斯的诗作后极为赞赏,认为项斯的人品和才华远超其诗作本身。这首诗高度评价了项斯的才华和品德,并表示自己将四处推荐他。项斯以诗文闻名却屡试不第,有了杨敬之“逢人说项”的夸赞,项斯声名远播,并在次年科举中高中进士。



清赵翼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长江后浪推前浪,本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但这些不遗余力奖掖提拔青年才俊的杰出人物,他们没有凭借手中的资源人脉打压排挤后辈晚学,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地位倾轧阻碍他们的发展,相反甘愿以成人之美之心、以乐为人梯的义举,竭尽全力提携扶持,心甘情愿“放他出一头地”,尽己所能给年轻人出人头地的机会和展示才华的舞台。这种坦荡磊落的襟怀,超越高远的格局,豁达非凡的气度,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而这些人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段让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满庭芳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自1958年上映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之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党在隐蔽战线与敌斗争的电影,它不追求惊心动魄的情节,而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讲究含蓄的情感和内在的张力。

杨仲达



电波永不消逝